



▶ 2006年，邓玉平与本报记者共同寻访海拔最高的红军墓

上海的天，开始变热了。

过去，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家家户户把凉床搬到室外，芭蕉扇摇出的风里混着茉莉花香。父亲邓志云坐在凉床边，一只手轻轻扇风，另一手指着天上的星星讲故事。

“这颗是牛郎星，那颗是织女星，他们隔着银河，每年七夕才能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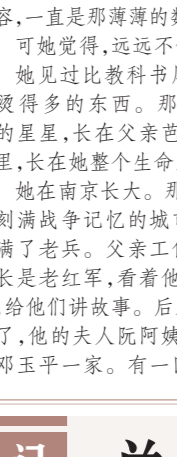
再往远处看，星星一闪一闪的。

父亲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我好想他们。以后有机会，我要带你们到长征路上去看他们。”有些东西种下了，就再也拔不掉了。很多年后邓玉平才明白，那一晚父亲播着扇子种进她心里的，不是故事，是一颗要在长征路上走一辈子的种子。

今年开春，这颗种子在贵州石阡的山间发了新芽——邓玉平到困牛山红军学校，再赴石阡甘溪红军小学，给娃娃们上开学第一课，讲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这条路，邓玉平还没有走完，即将年满70的她，不久后又将向“过草地”发起挑战。



■ 邓玉平介绍寻访红军的经历 本版图片 邵阳 摄(除署名外)

记者手记

总有人记得

一名历史教师重走了十五次长征路



■ 2016年，邓玉平参与本报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途经泸定桥

的孩子口舌生疮，阮阿姨二话没说，跑到大学校园里的山上去采菊花瓣，浑身稀泥地敲开门，手里拎着一袋菊花脑和一兜鸡蛋。

邓玉平常常想起这个画面。她觉得，自己这一生是在老红军们环绕下长大的。他们对身边每一个人都像亲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一样。

厂里流传着关于父亲的无数细节——下棋没有人能赢他，乒乓球打得好，钓鱼技术超高。她也记得，家里吃鱼永远只有一条。父亲钓四条鱼，就叫她楼上楼下送三家，自己家留一条。走在街头，一看到有人推板车，父亲就冲上去帮忙。一手牵孩子，另一只手搭在板车后面使劲推。板车轱辘吱吱呀呀地响，父亲弓着背，嘴里喊着“一二三”。邓玉平的小手被攥得生疼，可她

从没叫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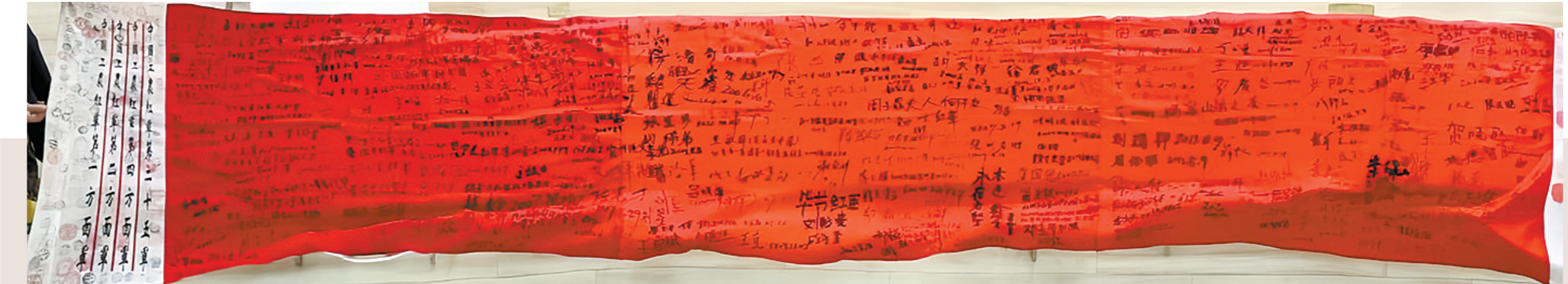
父亲12岁在四川江油老家参加红四方面军，那是1935年。嘉陵江的水流湍急，一个12岁的孩子，个头没有枪高，跟着队伍向西挺进。因为出了一个红军，家里很多人都受了牵连。邓玉平后来才知道，在当年的苏区，这并非个例——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连名字都没留下。

父亲很少说这些。他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最高兴的时候，是从外面做完长征讲座回来——邓玉平能感受到，因为家里会烧肉吃。父亲攒了一摞红领中，好几本笔记本，都是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长征时拿到的纪念品。

1991年，邓志云去世了。邓玉平觉得，父亲走得不突然，可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上海不在长征的路线上。长征经过的万水千山，从瑞金到延安，绕过了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可是上海与长征之间，有一条隐秘而坚韧的线——

宋庆龄在上海，帮助了埃德加·斯诺去陕北采访。斯诺的《



◀ 收集的红军签名 受访者供图

她学历史、教历史，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可她心里明白，如果自己不走一遍父亲走过的路，她永远是课本里那两页纸的“搬运工”。

2004年，她决定一个人走。出发前三个月，她每天坚持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锻炼身体。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不算好，可她不知道前方等着她的，是比这些病痛更危险的未知。

那年夏天，她从上海出发，沿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第一次重走长征路。

第一站，是父亲的老家四川江油——李白故里，涪江边的青莲镇。她在父亲长大的地方站了很久，想象那个12岁的男孩怎样从这片土地上离开。然后她一路西进，最后到达延安。原本已经完成了预设的路线，可在西安火车站排队买票时，邓玉平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要再去通南巴？

川陕根据地的将帅碑林、通江红军烈士陵园，一位党史研究室的老师提过一嘴，她一直记着。

她打电话给姐姐。姐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当你的大脑和内心发生矛盾的时候，请选择你心里所想的。”

挂了电话，她买了一张到广元

的票。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084位红军英烈。她一个人走进来，周围安安静静，她坐在墓碑中间，没有一丝害怕。那些名字刻在石头上，风吹日晒，有些已经模糊。她想象他们活着的样子——年轻的，笑着的，也许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

离开陵园时天快黑了，镇上的旅馆只剩地下室。她摸黑出去吃饭，忽然停电。她本能地感到不安全，决定连夜赶回县城。一位“摩的”小伙子愿意送她，80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小伙子说大路远，走小路近很多，但颠簸。她说怕。

摩托车钻进大山里，天彻底黑了。到了一个U字形的弯道，远处忽然出现三个彪形大汉。小伙子的声音发抖：“前面有路霸。”他犹豫要不要退回去。

马驮着她往山上走。她抱着马脖子，整个人像一片树叶贴在马背上。她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上的马、怎么下的马，只记得马背很温暖，像小时候父亲抱着她。

晚上7时半，天彻底黑了。远处忽然出现了一条公路，像一条发光的飘带横在夜幕中。队友们看见灯光，歇斯底里地喊起来：“加油！加油！”

邓玉平被拖上了公路。所有人都在喊，有人哭了。她坐在地上，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重生。

那一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六周年。她走过的那片草地，当年右路军的将士们走了整整七天。而她只走了一天，就几乎把命丢在了那里。

走出草地，邓玉平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地方吃饭，而是打开背包。那个暗青色双肩包跟了她十几年，被汗水、雨水、泪水反复浸透。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红旗。展开来，旗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有的工整，更糟糕的是，指南针和指北针在这里全部失灵。走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草地上到处都是河，宽到无法跨越。邓玉平以前读红军回忆录，总是不理解“过河淹死了人”是什么意思——草地怎么会有河？现在她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浑身发抖，终于懂了。

一天之内，四季轮转。早晨阳光灿烂，到了中午忽然下起冰雹，砸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冰雹过后是小雨，雾气弥漫，能见度不到十米。邓玉平全身湿透，体温在流失，意识开始模糊。她带的雨衣为了轻装没带，是另一个队友把雨衣脱下来给她。

就在这时，雾的深处出现了几匹马。是云朵变成了马的形状，朝他们飘过来。邓玉平以为是幻觉，可身边的藏族人已经迎了上去。真的是马！不知道他们用藏语说了什么，马停下来，藏族同胞把她抬上了马背。

邓玉平每次路过遵义路、延安路、泰山公路等路牌，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她说，上海市区没有长征路，可上海到处都是长征的影子。

我第一次见到邓老师，是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那年。新民晚报社联合团市委策划“重走长征

路，青春心向党”活动时，邓老师是特邀的领路人。那时她已经走了十一次长征路，背包里还带着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她走在队伍里，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我们从上都出发，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走了十来天。

我还听同事曹刚说起另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曹刚和高老师一起去寻访一座海拔最高的红军墓。那座墓在四千多米的雪山上，氧气稀薄，邓老师的氧反很严重，嘴厉害，带着那瓶氧气，嘴厉害，走路都在晃。大家都劝她留在

山下，她不肯，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闭嘴的话：“我爬也要爬上去。不回去，我会后悔一辈子。”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我再次采访邓老师，她还是那样，说话有点急，讲到动情处会卡壳，重复，会突然停下来喝水，再接着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件：“这是我父亲的某事。谢谢你，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玉平捧着手机哭了很久。她后来常常想，也许老人一直在等——等一个能把名字留在红旗上的人，等一个能把他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人。

红旗上的名字，有时还会“说话”。有一年，邓玉平带着旗子去拜访一位老红军。他接过旗，忽然指着其中一个名字叫起来：“我们一个连的！”

两个七十多年没见的老战友，名字在红旗上重逢了！

类似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老红军们看到熟悉的名字，眼睛一下子亮了，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起当年的往事——谁在雪山脚下放过一碗青稞，谁在草地上拉过谁一把……邓玉平在旁边听着，一笔一笔记下来。她知道，这些故事如果不记，就真的会被风刮走了。

邓玉平说，从2004年到今天，旗上的名字是多了，但能够在旗上签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这面旗，渐渐成为一部活着的名册。名册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可他们的名字留在旗帜上，像当年长征路上的脚印，踩在雪地里，天变暖了也不会化。

就像在跟我们说话。”她说。

“就像在跟我们说话。”她说。

邓玉平说，从2004年到今天，旗上的名字是多了，但能够在旗上签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这面旗，渐渐成为一部活着的名册。名册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可他们的名字留在旗帜上，像当年长征路上的脚印，踩在雪地里，天变暖了也不会化。

他们没有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过的山河里。

邓玉平早就退休了。可她站过讲台，比退休前更多。

她为各地各界作长征主题讲座400余场，她写的《长征路上血脉情》一文，还被编入《大学语文》教材，成为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必读篇目。

她带着学生一起给老红军写信。一百多封信寄出去，大多都收到了回信。有一位老红军叫田震，回信写了14页，九十多岁的人了，自己坐公交车到邮局去寄。

她带着学生们，连续七年元旦去拜访老红军。孩子们用稚嫩的手去摸老红军身上的弹壳，回来写心得体会，说“这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爷们们用命拼出来的”。

山下，她不肯，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闭嘴的话：“我爬也要爬上去。不回去，我会后悔一辈子。”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我再次采访邓老师，她还是那样，说话有点急，讲到动情处会卡壳，重复，会突然停下来喝水，再接着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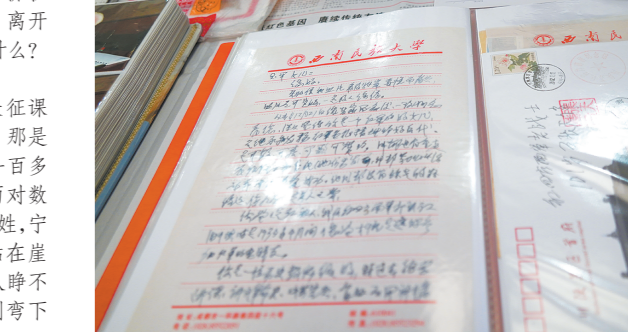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 收藏品上盖满了长征路上各地的印章



◀ 寻访老红军收获的资料



◀ 寻访老红军收获的资料

女红军故事，她曾不幸被俘，身陷囹圄，但一辈子坚定跟党走……

课后，有一个孩子跑过来拉着她的手：“邓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她说：“来。只要我还走得动。”

事实上，从2004年到现在，邓玉平已经走了十五次长征路，有统计的行程超过十万两千里。她拜访过三百多位老红军，留下了无数录像、照片、日记和那面签满名字的红旗。不少老人握住邓玉平的手说：“孩子，你要把长征的故事一直讲下去，讲给所有人听。”

邓玉平用力点了点头。

她会讲到什么时候呢？

她不知道。但只要有人还愿意讲，还有人愿意听，长征就永远不会结束。

就像父亲告诉她的——天上的星星，是一闪一闪的。

它们一直在那里。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

讲。讲到父亲，讲到那些签名的老红军，讲到过草地，她的眼眶红了又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想起开头写的那句话，“那些一闪一闪的，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

邓老师找了他们大半辈子。